

读书时间

《新修本草》(《唐本草》)是唐高宗显庆年间一部由政府名义编纂的药典,该书53卷,载药844种,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医学著作。但该书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所载药物不全。《新修本草》由政府主持修订,一些在基层民间和偏僻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中药没有收入。随着唐王朝的繁荣开放,一些外来的药品也没有收入。二是内容存在个别错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这在所难免。所有这些问题,需要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进行解决,他就是有着“四明医学之初祖”和“茶疗鼻祖”之称的陈藏器。

陈藏器,盛唐时期著名的中药学家,四明(今浙江宁波)人。陈藏器从小喜欢医学,并且颇有成就,即便就任京兆府三原县尉期间,他也把医生作为自己的第二职业,悬壶济世,为人疗疾。由于医术高超,找他看病的人颇多。唐玄宗十八子李瑁得怪病,瘦骨嶙峋,多方诊治,未见其效。唐玄宗很生气,开除了几名太医,也没有效果。陈藏器用秘方“药茶”为李瑁治疗,不久痊愈,唐玄宗封因此其为“茶疗鼻祖”。

陈藏器最大的贡献是针对《新修本草》的缺点,编写了《本草拾遗》这本医学巨著。《本草拾遗》共10卷,分为3部分,其中序录1卷,拾遗6卷,解纷3卷。该书兼顾药理学和实际应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陈藏器创立的“十剂”药物分类方法是按药物的性能分类的,和现代分类方法颇为相似,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后世方剂学按功能分类奠定了基石。

《本草拾遗》6卷,共载《新修本草》未收之药692种(一说712种)。每药详述药名、产地、性状、采制、性味、毒性、药效、主治、禁忌等。这些药物来源广泛,既含内陆又达滨海,既有汉族药物又有少数民族药物,还包括国外传入的药物,如罌子粟(内陆)、海马(滨海)、苍梧(壮族地区)、甘蓝(欧洲)等。

《本草拾遗》解纷3卷,主要是解决日本著作药物记载之纷乱,考证品种,订正讹误,辨析形态、性味相似易于混淆者,现知论药269种。一是纠正了旧说的错误。比如关于药性,如他指出接骨木有小毒,本经云无毒,是错误的;姜黄性热不冷,本经(指《唐本草》)云寒,也是错误的。陈藏器的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再比如品种,陈藏器认为苏恭把女萎、萎萎分为两物是错误的,而茵桂、牡桂、桂心是一物。二是扩充了药物的功用。比如陈藏器提出葛根煮食可以消酒毒,乌贼墨有止血作用。三是提出新的治疗方法。比如温泉洗浴可以治疗疮痍,热敷物理疗法治疗关节疼痛等。

陈藏器一生致力于钻研本草,调配了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在《本草拾遗》中,他综合了《新修本草》与《食疗本草》中对茶的认识,在其他本草记载茶能消食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久食(茶)令人瘦,去人脂”的观点。这一观点非常科学,即现在我们熟知的茶能减肥。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提出:“诸药为各病之药,惟茶为万病之药”的观点,奠定了他在本草茶疗领域的崇高地位。

《本草拾遗》也存在有缺点。由于受外来印度医学的影响,陈藏器认为人肉以疗羸疾,于是人肉、人血、人骨、人胆等皆可入药。虽然后世医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仍旧流毒甚广,甚至成为后来外界人士攻击中医的靶点。

即便如此,《本草拾遗》一书仍旧是瑕不掩瑜,被认为是唐代继《新修本草》之后最伟大的本草类书籍,后世重要的医学书籍多有引录,日本医籍也均有引用,说明域外医家对此书也非常重视。

陈藏器,虽曾因肉入药事件饱受批评,但他一生致力于钻研本草,拾遗解纷,开启了我国茶疗文化的先河,可算是奇节之人。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

兼顾药理学理论和实际应用

《本草拾遗》的学术价值

□黄新生

我与中医

橘皮芳香



橘子红了,在阳光下,红艳光鲜,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我从小就知道家乡的橘子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走到哪里也不忘宣传介绍一番。一些外地的友人在橘子上市的季节专程赶来品尝,每逢此时,我都会在一旁很“煞风景”地提醒:橘皮不要扔,待会儿给你们熬橘皮粥喝。此举多半会引得朋友们面面相觑。

时过境迁,然而我的橘皮情结始终不改。当初的九制陈皮仍是我的挚爱,每当油腻的东西吃得太多,食欲不佳时,我也会做橘皮粥开胃。在粥滚烫前,放入几块洗净的橘子皮,等粥熬稠后,橘子皮的芳香尽在米粒之中,米粒晶莹剔透,橘香与米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橘皮粥浓稠味美,眼观,细品,清目爽口。粥取橘之色,橘吸粥之稠,时时温暖着胃,温暖着记忆。

不管什么品种的橘子,皮都极苦,但它那火红的色调却映亮了我们的生活!橘子吃了,皮也不能浪费,它留下的是最质朴、最初的味道。在喧嚣而繁杂的生活里,能够分享这份清心的苦味,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四川省 张春波)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洛宁、孟津

“洛出书”“河出图”

“河图洛书”之说

“河图洛书”是华夏文化的源头,发轫于《周易》的阴阳学说、象数思维及整体观,奠定了医易会通的基本格局。而“河图洛书”又与《周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系辞》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圣人就是人类文化始祖伏羲。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

“洛书”,相传为大禹之时的,洛河中浮出之龙首神龟所献,龟甲上背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居中”的图像,故称为“洛书”。大禹得到此图后,依此图治理水患,划定天下九州,又依此图制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天下大治。《系辞》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洛出书”寻踪

“洛书”真貌,虽然众说纷纭,但“洛书”出于洛宁,“洛出书”处在洛宁的确是有据可查的。现今存于洛宁县西长水村的专门记载“洛书”之源的两通古碑,就是“洛出书处”的有力证据。而这两通古碑也是洛河流域唯一能够证实“洛出书处”的实物证据。

洛宁上游多系高山峡谷,下游则一马平川,西长水村即建立在洛水下游的平原之上。两块碑刻原立于村东洛河上下游交汇处,后被移置当时的县城所在地今西长水村保存,移存时间,从立于旁边的清代雍正石刻来看,要早于清代之前了。碑刻原来所在地,西依龙头山,有“灵龟负书处”的玄扈河,龙头山山顶有“禹王庙”“洛河龙神庙”和“洛书赐禹之地碑”等古代遗迹;山南则有紫盖寺遗址及明代吏部尚书耿裕墓,其南临洛河,对面石壁上有“岳武穆行军至此”的石刻和武穆营遗址,其相邻为“仓颉造字台”。西长水村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

在长水村村西,玄扈河与洛水交界处的山中尚存有龟窝遗迹,相传为神龟出世的所在,且有摩崖刻石为证。刻石是明代广东道进士西蜀刘武臣专程来洛宁探访“河出图处”与龟窝所留的诗记。

“洛出书处”石碑,碑石约高1.7米,青石质,圆首方足,阴刻有双龙碑额,双龙环拱“大清”二字,下为“洛出书处”四个行书大字,右侧题“河南尹张汉书”,左侧题“雍正二年间腊月永宁县令沈育立”。

西长水村依洛水而建,处于洛河上下游分界处,住上游多系高山峡谷,下游则一马平川,西长水村即建立在洛水下游的平原之上。两块碑刻原立于村东洛河上下游交汇处,后被移置当时的县城所在地今西长水村保存,移存时间,从立于旁边的清代雍正石刻来看,要早于清代之前了。碑刻原来所在地,西依龙头山,有“灵龟负书处”的玄扈河,龙头山山顶有“禹王庙”“洛河龙神庙”和“洛书赐禹之地碑”等古代遗迹;山南则有紫盖寺遗址及明代吏部尚书耿裕墓,其南临洛河,对面石壁上有“岳武穆行军至此”的石刻和武穆营遗址,其相邻为“仓颉造字台”。西长水村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

对于碑石仅剩“洛”字的原因,可能因该碑最初被立在洛水边,由于河水泛滥长期冲刷所致,故而使得原本刻有“洛出书处”的古碑只剩下一个“洛”字,甚或也磨灭为题名落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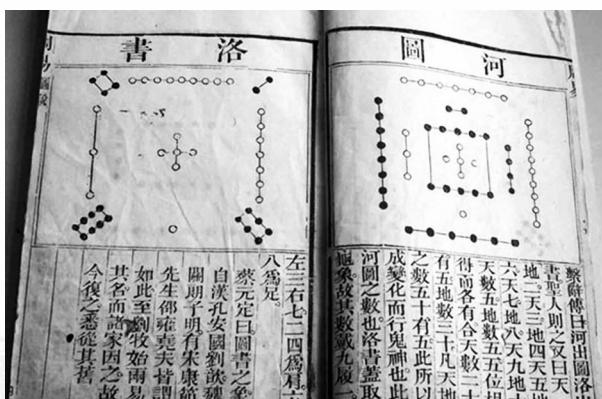
龙马负图、神龟献书,远古时代“河图洛书”的传说,数千年来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河出图”位于孟津,“洛出书”位于洛宁,早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河图洛书”在华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河洛文化的源头之一,是中国字形文化的第一幅神秘图案,对人类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计算机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龟窝与摩崖诗刻

龟窝这一称呼,在史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据明代《河南府志》记载:“永宁县(即今洛宁县)西有玄扈水。黄帝时,史臣仓颉从帝南巡,临于此水,水开一窝有龟出焉,厥背赤甲青文。”明代《河南通志》记载:“龟窝,在永宁县西洛水北岸水滨,乃夏禹治水洛龟呈瑞处。”玄扈河分下、中、上三部分,分别称为上河槽、中河槽、下河槽,当地民谣称:“上河槽、下河槽,金银财宝在中槽。”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龟窝、石壁诗都在玄扈河中段。

龟窝呈椭圆形,直径10余米,又名龟池,原来池边石壁上刻有龟池的石刻大字,可惜早年因山崖坍塌,现在已杳不可寻。顺着龟池攀崖而上,就到了摩崖诗刻。诗刻于一侧山壁,楷书,题目为《龟窝负书至此偶成》,诗曰:“引蔓缘崖步涧泉,鸟声正尔弄清妍。潜踪莫遣惊飞去,留与游人当管弦。”署名是“广东道进士西蜀刘武臣书”。刘武臣是四川宜宾人,明朝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进士,曾官广东道监察御史。500多年前,交通极为不便,刘武臣能远行千里,抵达洛宁游览龟窝,可见,明代之时,人们已普遍认为此地为神龟负书,即“洛出书”的所在地。

龙马负图的传说



据《礼记·礼运》载:“河出图。”郑玄注:“图,龙马负图而出也。”《汉书·五行志》说:“刘歆以为伏羲氏(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刘勰《文心雕龙·正纬》也提到:“龙马出而大《易》兴。”这些文献资料都说明,人文始祖伏羲氏依“河图”而画八卦,开启了《周易》哲学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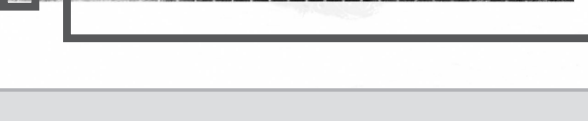
今孟津县会盟镇雷河村尚存有多种与“河图”相关的地名,在雷河村南部有条源于孟津县,向东南汇入黄河的图河,沿河岸分布有卦沟、负图、上河图、下河图、孟河、马庄等村名,相传该地域就是当年伏羲氏降服龙马、受“河图”而画八卦的地方。

河洛文明之思

以伊洛盆地为中心,以“河图洛书”为文化核心的“河洛文明”,构建了早期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所在。导源于“河图洛书”的天人相应模式、象数思维模式以及气运法则,对中医天人思想、脏象学说、脏气升降学说都有深刻影响。如何进一步探讨作为《周易》源头,乃至中华文化源头的“河洛文明”与中医学

的关系,更好地释读中医理论,进一步推进中医理论的现代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河南省中医管理局供稿)

中原中医药文化遗迹和文物



郑州仁济医院举办创面修复新技术培训班

本报记者 杨须 通讯员 任筠

一直以来,创面修复治疗是临床医学的热点和难点之一。为了进一步促进临床诊疗新技术、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应用,推动继发性创伤和慢性创面修复治疗的急、慢性创面的治疗和修复技术的进步,11月5日,由郑州仁济医院牵头主办的创面修复新技术培训班在郑州成功举行。全国著名骨科专家、手外科专家、显微外科专家、西安医院院长裴国献教授,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海医院张春才教授,解放军昆明总医院骨科主任徐永清教授,解放军第一五三医院手外科主任周明武教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吴学建教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花奇凯教授,郑州仁济医院院长侯健奎等授课专家,以及来自全省各地的骨科医生及郑州仁济医院相关科室的医务人员共150余人参会学习。

裴国献在《重视软组织损伤的伤情评估与科学处理》的讲座中,针对目前全国创面修复发生的态势,系统讲述了肢体伤情的评估与软组织损伤分类、肢体严重创伤评分以及损伤后的术前计划、手术时间、早期处理的原则等。他指出,对于肢体的复杂伤情,显微外科医生的特点就是要保肢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仅有一颗慈善的心是不够的,在严重复杂的伤情面前,要拿出科学的处理方案。裴国献认为,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只看到对离断损伤骨骼的处理,只注意到硬组织,而忽视了肌肉、血管等软组织的损伤处理。他着重强调了血管修复分秒必争及其重要性,并要求“要彻底清创,防止感染,不可重内轻外、重硬轻软,必须先软后硬、软硬兼施”等,也就是要怎么处理好肢体“软”和“硬”的问题。他说,不可以只重视内部而轻视外部,如果只重

视硬组织而忽视了软组织。科学的方法是应该先处理软组织,再处理硬组织,让肢体的软组织达到和谐统一,最大限度保证肢体安全,避免截肢,并使其恢复功能。张春才在《骨折与骨不连》的讲座中,引用了大量的案例,分析了“生理性成骨力值”的知识,并强调了“一定要重视预防软组织感染”。他说,“显微外科要走自己的路,复杂创面修复的问题,看似简单,但暗藏很多风险,一定要小心。比如多处骨折伤,开放性骨折等,一定要仔细检查,不能有遗漏,否则会很麻烦”。周明武在《感染性骨缺损伴皮肤软组织缺损的治疗》的课题中,针对骨感染的因素、机制以及相关检查等进行了全面讲解,通过案例的展示,让与会人员直观看到不同部位出现骨缺损该如何解决。花奇凯分享的《横向骨搬运

治疗糖尿病足》,以手术简单、创伤小,却能治疗极严重的糖尿病足,而且拥有极好的效果,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裴国献更是在点评中激动地讲,“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报告了,糖尿病足是非常棘手的,花教授采用的这种方法非常神奇,可以很好地解决此难题”,并当场邀请花奇凯参加明年在上海举行的创新病例大赛。郑州仁济医院专家张松健、谢书强、董其强依次做了《手部组织缺损的常用皮瓣修复技术》《下肢骨与软组织缺损的修复重建》《游离皮瓣移植在肢体离断再植中的应用》的讲座,将丰富的临床经验及创面修复、皮瓣设计等具体的问题进行分享,为与会人员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作为此次学习班的压轴授课嘉宾,徐永清向参会人员讲解了多个课题,包括《数字化技术在穿支皮瓣中的应用》《胫后动脉穿支皮

瓣的临床应用》《双蒂腓肠肌瓣修复跟腱及皮肤缺损的应用解剖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等,全面、详细讲解了各种皮瓣的应用及注意事项等,对临床医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本期培训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方位展示了创面修复新技术的特点、展望及新技术、新方法等,引起了参会学员的积极反响和深入讨论。大会均表示受益匪浅,并希望这样的培训可以多举办一些。侯健奎在培训班结束时的发言中表示,此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扩大了创面修复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在人才培养、学术推广、技术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了全省创面领域的临床治疗水平。今后,郑州仁济医院会举办更多类似的新技术、新方法等专业培训班,为中原百姓造福。